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辑)

总主编/李玉明



54

刘少奇在山西

张国祥

/著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曾经4次踏上山西这块热土。山西深深留下一代历史伟人的光辉足迹，刘少奇和三晋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王灵善

刘小玲

复 审:石凌虚

终 审:张安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少奇在山西/张国祥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8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0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868-3

I. 刘... II. 张... III. 刘少奇(1898~1969)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771 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0辑)

刘少奇在山西

张国祥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15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

ISBN 7-203-04868-3
K·313 定价:(全套 10 册)30.00 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任继愈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
张国祥	张根玉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目

录

一、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八个月	(1)
(一)运筹帷幄,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二)扫除迷雾,指导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	(9)
(三)大刀阔斧,组建华北抗日武装部队	(17)
(四)呕心沥血,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	(22)
二、对山西抗战工作的再指导	(27)
(一)关于减租减运动	(28)
(二)关于群众游击战争	(36)
(三)关于对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46)
三、在晋绥解放区的日子里	(52)
四、来山西视察工作	(59)

引子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他的一生中，曾经 4 次踏上过山西这块热土：第一次，是抗日战争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在山西前线战斗、工作和生活了将近 8 个月；第二次，是抗日战争中期的 1942 年，他由华中回延安中共中央工作，路经华北解放区时，又对山西抗战工作做了三个半月的指导；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 1947 年 4 月，他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由陕北赴河北平山西柏坡村，路经晋绥解放区，在晋西北停留了 23 天；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即 1958 年 2 月，他来晋对山西工作进行了历时 8 天的视察。山西深深留下了一代历史伟人的光辉足迹，刘少奇和三晋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无产阶级情谊。

一、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八个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北平移驻太原。作为新组建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从 1937 年 7 月下旬由陕北抵达太原，到 1938 年 3 月下旬留延安中共中央工作（仍然负责指导华北抗战工作），先后转战太原、临汾、晋西南，在山西前线战斗、工作和生活了将近 8 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

历史关头。在这中间，刘少奇同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一道，领导和指挥华北党和八路军，首先踏上实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光辉征途，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壮大党的队伍，建立根据地，为开创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局面，做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一) 运筹帷幄，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是刘少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及其重大历史意义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论述。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运筹帷幄，精心部署，在准备抗战的历史阶段，以平、津为中心，推动了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功地准备了党、准备了群众，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光辉成果，开创了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的新局面；在进入抗战的历史阶段以后，又以山西为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开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西成为中共北方局工作的重心。为了支援八路军挺进敌之翼侧和后方，迅速占据五台山区的晋东北、管涔山区的晋西北、太行山区的晋东南、吕梁山区的晋西南等战略要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刘少奇把扩大与发展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动员群众，组织一切力量参加抗战，确定为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各地党组织的主要任务。鉴于已有的上层统战工作和发动基层群众相结合的实践经验，他在部署和指导新的历史阶段的统战工作中仍然坚持运用了这一正确的方针。他指示山西党组织，要按照“洛川会议”的精神，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去发动群众，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同时要继续推动上层统一战线，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时，合作才能持续下去。他要求山东、绥远等省的党组织，在准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认识推动上层、发动群众对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使共产党成为抗战核心的决定意义，并把它付诸于实际行动。他还专门召集中共北方局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开会，深入阐述了七七事变以后的新形势和党的政治任务，反复论述了推动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明了应当采取的策略方针，确定了开展华北地区上层统战工作的具体任务：王世英留山西，继续主持华北联络局（中共北方局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的工作；南汉宸在太原，主要推动阎锡山抗战；阮慕韩去张家口，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的工作；张友渔到济南，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工作。

为了扩大与发展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在刚刚到达太原时，就提出了在战区准备建立抗日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主张。不久，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赴太原，就山西统战工作和参加政权问题同

刘少奇进行了深入研究，确定了原则意见。遂即，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进一步谈判协定，于1937年9月20日正式成立了由共产党和八路军公开领导的、各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参加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共产党、八路军派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程子华、武新宇等参加“战动总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接着，刘少奇就对这些同志做了重要指示，要求他们既要利用阎锡山给的合法牌子，又不要停留在阎锡山限定的范围内，在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下，把我们的力量发展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战动总会”一成立，就以它新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姿态，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由此，刘少奇给予高度估价，说它“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在这期间，刘少奇特地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进行了接谈，说明了“牺盟会”和共产党的关系，阐述了发展统一战线的宗旨，表示了彼此可以长期合作的态度，提出了双方都应得到发展的主张。从而“缓和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他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公开做了一次报告，分析了抗战开始以后的形势，向“牺盟会”提出了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的要求，号召学生和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并以“牺盟会”的名义，亲手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为公开合法地发动农民群众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抗战初期的华北，是最复杂、也是矛盾最多的地方。它

有多种军队与派别，因而有各种思想与行动，有抗日的，有动摇的，还有伪军与伪组织。各派别对统一战线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对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更不一致：有的主张抗日，但始终反对共产党，也不赞成统一战线；有的赞成统一战线，但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合作，而要秘密地合作；有的赞成与八路军合作，不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有的是要下层合作，不要上层合作；有的主张抗战，但不是为了打日本，而是要反对蒋介石和阎锡山，或者反对其他派别等等。对于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形，特别是对于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北方局指导统战工作的实践经验，刘少奇于1938年3月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中做了充分说明和科学总结。他指出：“从这里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用单纯的一种办法是不行的，而是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活泼的办法。而且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定的方针，一定的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日本，抵抗日本的侵略。不抗日是没有统一战线可谈的！”具体地说，就是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比如，对赞成统一战线而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合作的，可先与他们秘密合作，然后逐渐转为公开的合作；对赞成同八路军合作而不愿同共产党合作的，可用八路军的名义与他们合作；对与共产党合作去反对蒋介石、阎锡山的，应采取拒绝的态度，并好好向他们解释：合作是好的，但在民族危急关头，不能自己反对自己，而应联合一致对外抗战。如果晓以大义，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好，不愿合作就作罢。

论，如此等等。实践证明，运用这样有针对性的灵活的方式、方法去推动上层统一战线是行之有效的。同样，在开展民众运动方面，刘少奇也从实践经验中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其中最主要的有：第一，要启发群众的革命自觉，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确有组织起来的必要，这是民众运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二，要了解民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工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教员、学生等），也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要组织民众，就必须根据不同民众及其不同的要求，用多种多样的办法与形式去组织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切忌用一种方法、一种形式去组织广大民众，这样是弄不出什么成绩的。第三，务必明确民众组织起来的任务，这就是：动员最大多数的群众参加抗战，参加抗战中的各方面工作，同时要照顾到民众的生活。我们的原则是，抗战必须改善人民生活，而改善人民生活又必须适合于抗战。抗日第一，改善人民生活第二。只有这样，才能使亿万人民群众发挥出巨大的抗战激情。对于敌占区的群众工作，刘少奇亦提出，必须加强我们的宣传，向群众进行详细的解释，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暴露敌人的罪恶与兽行。并且要选派可靠的工作人员，打进伪军与伪组织中去，瓦解伪军与伪组织。由于方针、原则的坚定正确，又由于方式、方法的灵活得当，便使抗战初期的华北统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显现出一派飞跃发展的大好形势，从而“在各种不同的激烈变化着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战场，并在战场上适当地布置开来”。

诚然，对于一个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党的领导人来

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一个清醒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清醒和自觉，不但表现在深切懂得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实现党的策略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地把它放在党的工作的突出位置上来，而且还表现在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着的形势，运用正确思想来指导统一战线的工作。所谓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严格依据客观实际，坚持两条战线作战，及时地警戒和反对党内有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以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实现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毋庸置疑，在这个关系全局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始终是非常清醒和自觉的。他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据此，在抗战爆发之前，为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领导华北党组织坚持开展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当进入抗战的历史阶段以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形势下，他又指导华北党组织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反对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上来。他不仅把这种指导思想贯穿到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与决议中，同时还坚决有力地去指导纠正正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右倾偏向。当时，有些人不同意中共北方局提出的行动方针，主张“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还有的人不善于随着形势的转变而改变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仍然囿于秘密工作的狭小范围，满足于一点一滴的做法和收获。对此，刘少奇“表现了既有驾驭革命形势的

魄力，又有掌握全局、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能力。他批判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自己把自己手足捆绑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又告诫人们，当着客观形势不利于前进时，就要善于等待，积蓄力量，不可盲动和冒险；当着形势飞速发展和革命高涨时，就应该抓住大好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直接关系着华北抗战的坚持与发展，因而刘少奇对山西的统战工作给以极大注视。当他觉察到山西的统战工作还不够放手，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阎锡山的“框框”的束缚时，他就立即提醒山西省党的公开工作委员会，并在指示中特别讲到了毛泽东的意见：要独立自主地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不要受阎锡山的“框框”束缚了。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我们的策略上必须有所改变。要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战动总会”成立后，很快打开了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政治局面。但阎锡山有所顾忌，竭力限制“战动总会”的活动地区，不准“牺盟会”参加“战动总会”，致使“战动总会”的工作发生了危机。针对阎锡山的错误政策和做法，刘少奇和周恩来就“山西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及时电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向阎锡山提出彻底工作办法，在任何地区任何问题上均以统一战线的政策打破其分割、对立抗战力量的阴谋；不论“战动总会”、“牺盟会”，共产党员除八路军外，应尽量用左派面目出现来团

结与发展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以树立山西的左派力量，便利统一战线的发展；动员工作要避名取实，尽可能地发动群众，推动左派、“牺盟会”及好的县长与特派员出头来，以便易于改革县政并领导筹款。针对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刘少奇在确定地把握阎锡山的本质的基础上，还系统地提出了根本的指导方针：“①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②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党派遣到阎锡山政府里做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引者）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③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④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由于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使得山西的统战工作在形势转变的重大关头不仅没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开创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即使在后来新旧两派的严重斗争中，“新派采取了坚决的方针，击溃了旧派的进攻，新派就更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了”。

（二）扫除迷雾，指导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曾经实行过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这就是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对这一军事战略转变看得很重，提得很高，说它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刘少奇亦从共产党领导武装和武装斗争的战略目标出发，紧紧抓住这一事关抗战全局的重大问题，和朱德、彭

德怀、杨尚昆通力合作，正确地指导八路军和华北党坚持执行并顺利实现了伟大军事战略转变，使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地、然而也是迅速地广大发展起来。

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实行对日抗战到太原失守，为开始并坚持执行阶段；从太原失守到晋东南根据地反敌“九路围攻”之前，为继续坚持执行并基本完成阶段。在这两个历史阶段，即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实现的整个过程中，刘少奇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邃眼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勇气，奋力扫除着层层迷雾，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装了八路军和华北党。

早在八路军出征华北抗战之前，刘少奇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地、有秩序地把华北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按照敌军后方、我军后方和战区的不同情形，对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做了恰当的部署。当八路军挺进华北，毛泽东就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北方局又进一步为华北党规定了“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行动路线”：第一，党在平、津的组织，目前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第二，在冀东和山东地区，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第三，在华北其他地区，应动员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第四，在即将失守的城市、

矿山、铁路、工业区，应动员工人、职员迅速迁移，号召工人、职员组织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由此可见，刘少奇对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做出的关于军事战略转变这一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是坚决、果断、迅速而富有创造性的。

为了使八路军和华北党组织的战略行动归于一致，在八路军刚刚到达太原时，刘少奇就立即召集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和地方党的负责干部开会，重申了共产党的关于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深入阐述了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大意义。他根据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及其军队和旧政权将大部退出华北，抗战的责任必然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的估计，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方针：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以使我们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这样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为了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必须这样做。然而，围绕着军事战略转变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在党内和军内的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些人过高地估计国民党抗战的一面，轻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击退敌人的进攻，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和方针。他们认为：华北不至于全部沦陷，用顽强的国民党正规战争可以阻止敌人前进，因而没有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的必要，它的意义和前途是不大的。而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枪是不可能的，且将会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的大破裂。至于在华北建立

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那更是统一战线政策所不允许的。他们的方针是：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军队进行正规战争，抵住敌人的前进。而敌人是抵得住的，至于抵不住以后的事情就不要去想它。两种意见，两种方针，论争激烈，尖锐对立。但是，刘少奇当即就洞察到了这种认识和方针违背客观实际的本质，因而坚定地指出它是错误的，理所当然地否决与批评了这种认识和方针。可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认识一经形成之后，就决不是为一次、两次会议所能够纠正了的。当八路军各部队挺进敌之翼侧，相继占据五台山区的晋东北、管涔山区的晋西北、太行山区的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的晋西南等战略要地，并继平型关大捷连续胜利地进击敌人，将这些要地开拓成为抗日游击区，而国民党军队则不断败退与溃散的时候，那些倾心幻想依靠国民党正规战争抵住敌人进攻的人们，尽管在事实面前输了脸，但仍然对华北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军事意义估计不足，甚至以国民党大军的溃败为根据，对游击战争的发展前途更加怀疑起来。他们以为，数十万久经训练的、超过日军数倍的国民党正规军，在极短的时间内竟被敌人所击破，难道由共产党和八路军组织起来的零散的人民游击队能与强大的敌人进行长期作战并取得胜利吗？针对这一情形，刘少奇于 1937 年 10 月 16 日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论著。这是共产党较早地、有系统地论述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和若干基本政策的专门著作，是一部深入宣传共产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教科书，也是刘少奇在理论和策略上对抗日游击战争的

一个重大贡献。在该书中,刘少奇阐明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趋势。他既依据国民党军队及其正规战争失败的局势,揭示了游击战争必将成为华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方式和它的重大意义;又从中日双方优劣条件的对比分析中,论证了发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必然和胜利前途。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正规战争的严重失败和继续受挫,游击战争就将不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而且成为“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我们如能动员几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开展与坚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就具有这样伟大的意义:①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②不断消耗日军的力量,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③围歼入侵之敌,部分地收复失地;④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揭露与牵制汉奸卖国贼的妥协投降企图;⑤游击战争将转变到正规战争,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刘少奇又有针对性地批评了某些人对发展游击战争持有怀疑态度的错误认识,但是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批评上,而是进一步帮助这些人深刻分析了诱发错误认识的直接原因。他指出:这种错误认识的发生,一是由于把华北正规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军队与华北人民本身,二是由于用看待失败的国民党正规战争的眼光来看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实际上,并不是国民党军队和华北人民的力量不能战胜日本人,而是国民党的错误领导没有发挥军队和人民的伟大力量,因此,华北正规战争失败的责任不能由国民党军队与人民来负,而是“应由政府当局负责的”。同